

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特征分析*

常进雄 赵海涛

【摘要】文章利用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所获得的微观数据,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比较频繁,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频繁的二次跨区流动有利于增加流动者的收益。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虽然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但与一次乡城流动存在较大差异。年龄偏大、人力资本拥有量偏低的农民工更可能进行二次跨区流动,这些发现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不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扭曲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

【关键词】农民工 二次跨区流动 工资 人力资本

【作者】常进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海涛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的二次流动问题。Knight等(2004)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是个职业流动很频繁的群体,职业稳定性不高,其流动性高于城市劳动者,也高于发达国家。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课题组(2014)发现,66.01%的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转换过就业的城市。严善平(2006)基于上海劳动力市场考察了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农民工的流动问题,也发现两者由于制度因素的原因而截然不同。梁雄军等(2007)把农民工进城之后的流动划分为“换地区流动”和“换企业流动”两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基本特点和影响因素,认为农民工的二次流动主要是为了争取和维护权益,“民工荒”是由于农民工权益意识增强进而促进了流动性所产生的。白南生、李靖(2008)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收入低是其流动的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样。

与城市户籍劳动力相比,农民工在二次跨区流动上表现出较高流动频率的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严善平(2006)认为,户籍决定性地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企业或部门性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劳动供给特异性及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1473159)的阶段性成果。

质,由于受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一般只能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民工为了谋求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往往需要变换就业的城市或企业(白南生、李靖,2008)。上述文献使我们对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有了初步认识,但目前尚缺少对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进行专门考察的实证研究。现有关于中国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少量文献基本上是对农民工进城之后在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的分析,并未区分农民工进城之后跨区流动与在同一城市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农民工流动之所以与城镇户籍劳动力的流动有较大差异,跨区流动是一个重要方面。鉴于此,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进行研究。本文中的一次乡城流动是指农村劳动力为了提高收入和促进自身发展到城市非农产业寻找工作的经济活动过程,通常称“外出务工流动”(梁雄军等,2007);二次跨区流动农民工是指已经离开农村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寻求工作或者提高收入等原因改变务工城市的求职谋生过程,也可以称为“变化就业城市流动”。需要强调的是,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是在完成一次乡城流动之后,在外地非农产业进行的跨区流动,也包括之后的多次跨区流动。在同一城市变换务工企业的流动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在劳动经济学中,通常把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或城市之间的流动或迁移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即劳动者为了获得长期收益而在短期承担一些流动成本。如果与流动相联系的收益现值超过了流动成本,那么劳动者就会流动到另外一个地区寻找工作;反之,劳动者就不会进行这种地理上的流动。本文认为,农民工在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中进行分析 and 理解。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借鉴 Borjas(1994)关于移民模型的设定,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构建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模型。假设外出务工农民工在流出城市 $i(i \geq 1)$ 的工资水平为 w_i ,在流入城市 $(i+1)$ 工资水平为 w_{i+1} 。 w_i 和 w_{i+1} 服从以下分布: $\log w_i = \mu_i + \varepsilon_i$; $\log w_{i+1} = \mu_{i+1} + \varepsilon_{i+1}$ 。其中, μ_i 为流出城市工资的平均值; ε_i 为流出城市工资中与 μ_i 不相关的离差项,且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_i^2 的正态分布; μ_{i+1} 为流入城市工资的平均值, ε_{i+1} 为流入城市工资中与 μ_{i+1} 不相关的离差项,且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_{i+1}^2 的正态分布; $\text{cov}(\varepsilon_i, \varepsilon_{i+1}) = \rho_{i,i+1}$, 即 ε_i 和 ε_{i+1} 的相关系数为 $\rho_{i,i+1}$ 。 $\rho_{i,i+1} > 0$ 表示在流出城市获得较高工资的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由于技能得到认可倾向于获取更高的工资。 $\rho_{i,i+1} < 0$ 表示在流出城市获得较高工资的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由于技能得不到认可反而倾向于获取较低的工资。

农民工流动决策,即是否从城市 i 流入到城市 $i+1$ 。农民工流动变量为:

$$SI_{i,i+1} \equiv \log w_{i+1} - \log(w_i + C) \quad (1)$$

其中, C 为流动的总成本(包含交通运输费用、放弃原来工作的机会成本和离开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心理成本等)。如果 $w_{i+1} > w_i + C$ 或者 $SI_{i,i+1} > 0$, 则农民工就会进行城市间的流动(即二次跨区流动);如果 $w_{i+1} < w_i + C$ 或者 $SI_{i,i+1} < 0$, 则农民工会停留在原城市,不进行城市间的流动。由于 $\log(w_i + C) \approx \log w_i + \frac{C}{w_i}$, 且定义 $\pi_i = \frac{C}{w_i}$, 即相对于流出城市的工资 w_i 而言,流

动总成本 C 对应的时间量。则流动变量变为：

$$SI_{i,i+1} \approx (\mu_{i+1} - \mu_i - \pi_i) + (\varepsilon_{i+1} - \varepsilon_i) \quad (2)$$

如果农民工进行流动,则意味着 $SI_{i,i+1} > 0$ 或者 $(\mu_{i+1} - \mu_i - \pi_i) + (\varepsilon_{i+1} - \varepsilon_i) > 0$ 。由式(2)和 $SI_{i,i+1} > 0$ 得出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 = \Pr[(\varepsilon_{i+1} - \varepsilon_i) > -(\mu_{i+1} - \mu_i - \pi_i)] = \Pr\left\{\frac{\varepsilon_{i+1} - \varepsilon_i}{\sigma_\varepsilon} > -\frac{\mu_{i+1} - \mu_i - \pi_i}{\sigma_\varepsilon}\right\} \quad (3)$$

定义 $Z = -\frac{\mu_{i+1} - \mu_i - \pi_i}{\sigma_\varepsilon}$, $\sigma_\varepsilon = \sqrt{\sigma_i^2 + \sigma_{i+1}^2 - 2\rho_{i,i+1}\sigma_i\sigma_{i+1}}$, 则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概率为：

$$P = 1 - \Phi(Z) \quad (4)$$

通过式(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frac{\partial P}{\partial \mu_{i+1}} = \frac{\partial \Phi}{\partial Z} \frac{1}{\sigma_\varepsilon} > 0$, 流入城市的工资均值与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概率成正比。(2) $\frac{\partial P}{\partial \mu_i} = -\frac{\partial \Phi}{\partial Z} \frac{1}{\sigma_\varepsilon} < 0$, 流出城市的工资与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概率成反比。(3) $\frac{\partial P}{\partial \pi_i} = -\frac{\partial \Phi}{\partial Z} \frac{1}{\sigma_\varepsilon} < 0$, 流动成本与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概率负相关。(4) $\frac{\partial P}{\partial \rho_{i,i+1}} = \frac{\partial \Phi}{\partial Z} (\mu_{i+1} - \mu_i - \pi_i)\sigma_i\sigma_{i+1}\sigma_\varepsilon^{-3} > 0$, 如果流出城市的农民工技能更容易(困难)转变为流出城市的技能,或者说农民工的技能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则会提高(降低)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概率。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理论框架及模型得到的结论,并结合样本问卷内容,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假设1:年龄是影响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小,进行二次跨区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如果把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一个人越年轻,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收益的时间就越长,这些收益的现值也越高,也就越可能进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假设2: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是影响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受教育水平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工,越有可能进行二次跨区流动。因为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身体越好,其劳动技能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就越有可能在其他城市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促进其进行流动。假设3:婚姻和孩子数量是影响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未婚农民工进行二次跨区流动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已婚且有孩子的外出务工就业人员,二次跨区流动可能会带来家庭成员的分离降低家庭效用,给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带来额外成本,而未婚农民工则成本较低。此外,对于已婚并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再次跨区流动就业还会带来子女教育和抚养问题。因此,已婚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成本更高,同时,子女数量也会对流动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决策原因,即: $\text{probit}(p_i=1) = \Phi(X_i \alpha_i)$ 。其中 $p_i = 1, 0$ 分别表示二次跨区流动和非二次跨区流动; X_i 表示影响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21个省、30个县的120个行政村,共调查了6203户家庭,28840人。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共14900人。“千村调查”问卷中,设有2000年以来在外务工期间是否转换过就业城市的问题,最多可以追溯4个城市。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在调查样本中外出务工或者有外出务工经历且年龄处于16~60岁的样本有4858个,其中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说明二次跨区流动比较频繁。

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拥有量对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影响与人力资本理论所预测的不太一致。从年龄结构看,随着年龄上升,二次跨区流动比率先下降后上升,而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应该是年龄越小越有可能进行跨区流动。从受教育水平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二次跨区流动比率下降;外出务工者个人健康状况对二次跨区流动有密切关系,健康状况越好,二次跨区流动的比率越低;而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进行跨区流动。从婚姻状

表1 2000年以来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统计

	样本情况		二次跨区流动经历	
	样本量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全部外出务工样本	4858	100.00	0.640	0.480
年龄(岁)				
16~25	1231	25.34	0.650	0.477
26~35	1320	27.17	0.539	0.499
36~45	1103	22.70	0.597	0.491
46~55	853	17.56	0.732	0.443
56~60	351	7.23	0.895	0.308
性别				
男	2794	57.51	0.582	0.493
女	2063	42.47	0.718	0.450
婚姻				
未婚	1200	24.70	0.637	0.481
已婚	3655	75.24	0.641	0.48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794	36.93	0.692	0.462
初中、高中及中(大)专	2867	59.02	0.613	0.487
本科生和研究生	197	4.06	0.558	0.498
村干部				
担任或曾经担任	120	2.47	0.758	0.430
未担任过	4738	97.53	0.637	0.481
党员				
是	196	4.03	0.622	0.486
否	4662	95.97	0.641	0.480
健康状况				
非常好	1769	36.41	0.570	0.495
好	2146	44.17	0.643	0.479
一般	588	12.10	0.748	0.434
不好	355	7.31	0.794	0.405

注:(1)全部外出务工样本包括当前的外出务工者和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居民。(2)健康状况变量为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用1、2、3、4分别代表健康状况非常好、好、一般和不好。

况看,已婚和未婚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没有显著差异。性别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有较大影响,58.2%的男性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而71.8%的女性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从外出务工者的政治身份来看,对二次跨区流动的影响不完全一致,担任或者曾经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民工有较高的二次跨区流动比率,但是党员身份却没有类似的影响。

表2为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原因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工从一个城市流入另外一个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高、机会多和老乡介绍工作。说明流动的主要动力来自提高收入水平,以及对老乡的信任和相互帮助,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抱团”流动的特征。与流入原因相比,农民工流出一个城市的原因则相对多样化。首先,收入低、待遇差促进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寻求收入水平更高的工作;其次是因为在其他城市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第三是在当前城市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到其他城市寻找工作。另外,还有结婚或与配偶团聚、照顾家人、子女教育等原因。

表2 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流入和流出城市原因 %

	二次跨区流动			
	第一个城市	第二个城市	第三个城市	第四个城市
样本量(个)	1069	919	307	89
流入原因				
与配偶团聚	1.92	2.97	1.69	1.02
老乡介绍工作	45.68	42.75	49.83	47.96
(以为)收入高、机会多	38.43	38.46	34.58	31.63
方便子女教育	0.79	1.87	2.03	0.00
农业生产需要	0.35	0.11	0.68	0.00
照顾老人需要	0.61	1.98	1.36	0.00
解决户口	0.17	0.22	0.00	0.00
生活费用低	1.14	1.10	0.34	1.02
劳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好	0.17	0.11	0.34	0.00
其他	10.74	10.44	9.15	18.37
流出原因				
收入低、待遇差	28.06	25.21	22.41	14.47
找到更好的工作	17.22	14.31	12.07	9.21
自己创业	1.30	0.85	0.43	1.32
没有了工作	10.46	15.16	15.52	14.47
结婚生育或与配偶团聚	4.72	5.52	2.16	0.00
子女教育	2.50	1.42	1.72	0.00
农业生产需要	2.59	2.83	4.31	9.21
照顾家人	5.37	5.67	6.47	5.26
生活费用太高	2.31	1.84	1.29	3.95
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障	0.46	0.00	0.86	0.00
没有归属感	2.13	1.84	1.72	1.32
其他	22.87	25.35	31.03	40.79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决策原因,并在模型中控制了相关变量,如“参加社会保险”、“方便孩子教育”等,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农民工个体特征对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年龄和健康状况是影响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重要变量,但影响的方向与本文的假设不一致,主要表现是从年龄上看,年龄越大农民工的二次流动概率越高;从受教

表3 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因素估计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PM	Probit-AME	LPM	Probit-AME
受教育年限	-0.0075*** (0.0019)	-0.0086*** (0.0021)	-0.0068*** (0.0019)	-0.0078*** (0.0021)
年龄	0.0057*** (0.0007)	0.0062*** (0.0008)	0.0060*** (0.0007)	0.0065*** (0.0008)
健康状况	0.0622*** (0.0077)	0.0702*** (0.0086)	0.0557*** (0.0078)	0.0635*** (0.0088)
已婚	-0.1140*** (0.0185)	-0.1180*** (0.0182)	-0.1140*** (0.0184)	-0.1180*** (0.0182)
参加社会保险	-0.0447*** (0.0138)	-0.0555*** (0.0151)	-0.0489*** (0.0139)	-0.0594*** (0.0153)
家庭孩子数量	-0.0078*** (0.0018)	-0.0081*** (0.0015)	-0.0072*** (0.0018)	-0.0074*** (0.0015)
与配偶团聚	0.2120*** (0.0639)		0.2110*** (0.0638)	
老乡介绍工作	0.3060*** (0.0200)	0.3520*** (0.0112)	0.3060*** (0.0199)	0.3520*** (0.0111)
认为收入高	0.2680*** (0.0202)	0.3010*** (0.0139)	0.2600*** (0.0203)	0.2960*** (0.0143)
方便孩子教育	0.0502 (0.0849)	0.0931 (0.1230)	0.0457 (0.0847)	0.0990 (0.1220)
照顾老人需要	0.1400 (0.0867)	0.1890* (0.1050)	0.1320 (0.0865)	0.1780 (0.1100)
常数项	0.4170*** (0.0344)		0.4220*** (0.0353)	
样本量	4822	4772	4822	4772
Adj.R ²	0.3470		0.3510	
Pseudo R ²		0.2430		0.2470

注：模型 1、模型 2 分别为线性概率模型估计、Probit 估计的平均边际效应的结果，区域虚拟变量未控制；模型 3、模型 4 区域虚拟变量已控制；健康状况变量为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用 1、2、3、4 分别代表健康状况非常好、好、一般和不好；区域虚拟变量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区域哑变量。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估计值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育年限上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概率越低；从健康状况上看，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二次跨区流动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概率越高。上述因素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结合之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假设 1 和假设 2 不成立。

第二，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对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影响。从婚姻和家庭因素上看，已婚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概率更低。前面描述性统计中，婚姻状况与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没有显著关系，但在多变量分析中，已婚对二次流动有负面影响，这可能是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结果。子女数量越多，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概率越低。此外，由于照顾老人和与配偶团聚的考虑也会促使农民工进行二次跨区流动，可见家庭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此外，Probit 模型还证实了社会网络在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老乡介绍工作”是促使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重要动因。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往往不借助网络信息和公共职业介绍系统，而非常依赖老乡介绍工作。随着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的时候，需要思考在农民工的流动就业中如何发挥公共职业介绍和网络信息方

面的优势。

(二) 二次跨区流动与一次乡城流动的主要差异

中国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与一次乡城流动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检验中国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决策的特殊性,将农民工的一次流动和二次跨区流动进行对比分析。

表4显示了一次流动和二次跨区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差异,从中可以看出,具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的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较低、年龄偏大,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总体上看,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拥有量要少于那些仅有一次乡城流动经历的农民工。在家庭孩子数量和已婚比率方面,具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的农民工与其他务工人员差异不大。

为了分析农民工一次流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决策因素,与以往研究类似(王桂新、刘建波,2007;Zhu Nong,2002;都阳、朴之水,2003),本文仍然采用Probit模型进行检验,表5为估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以下特征。

第一,在农民工个体特征对一次流动决策的影响方面,与人力资本理论模型预测基本一致。从年龄上看,年龄越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越低。从受教育年限上看,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概率越高。从健康状况上看,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越高。从性别上看,男性较女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上述几个因素在控制了地区变量之后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一次流动决策与二次跨区流动决策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在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对一次流动决策的影响方面,与前述分析基本一致,也与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决策一样。婚姻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有负面影响,已婚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的概率更低;孩子数量越多,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概率下降越大。此外,家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村劳动力由于人地关系紧张,更倾向于外出流动;家庭劳动力(16~60岁)每增加1人,劳动力外出流动的概率增加3.14%。

表4 一次流动与二次跨区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

变 量	外出务工	一次流动	二次跨区流动	全部样本
年龄(岁)	35.78	33.84	36.88	37.77
受教育年限(年)	7.978	8.454	7.708	7.701
健康状况	1.903	1.733	1.999	1.910
家庭孩子数量	0.999	1.023	0.986	0.900
已婚比率(%)	75.300	75.100	75.400	76.900

注:外出务工指当前外出务工和曾经外出务工,一次流动指外出务工农民工中仅流入一个城市,二次跨区流动指外出务工农民工中流入至少2个城市;健康状况变量为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用1、2、3、4分别代表健康状况非常好、好、一般和不好。

对比农民工二次与一次流动决策可以发现:(1)一次与二次流动的共同点是为了提高收入,同时已婚对流动决策有负面影响,已婚农村户籍劳动力更不愿意进行乡城流动,在城镇非农部门就业的已婚农民工也不愿意再次跨区寻找工作。

表 5 农民工一次流动(乡城迁移)因素估计(N=14900)

变 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LPM	Probit-AME	LPM	Probit-AME
受教育年限	0.0017*(0.0009)	0.0018*(0.0009)	0.0018**(0.0009)	0.0019**(0.0010)
年龄	-0.0022*** (0.0004)	-0.0032*** (0.0004)	-0.0020*** (0.0004)	-0.0020*** (0.0004)
健康状况	-0.0273*** (0.0090)	-0.0273*** (0.0090)	-0.0241*** (0.0091)	-0.0242*** (0.0092)
已婚	-0.0219** (0.0096)	-0.0210** (0.0094)	-0.0207** (0.0096)	-0.0208** (0.0093)
男性	0.0294** (0.0143)	0.0296** (0.0143)	0.0287** (0.0143)	0.0288** (0.0144)
参加社会保险	0.0287** (0.0139)	0.0286** (0.0140)	0.0302** (0.0140)	0.0302** (0.0142)
家庭孩子数量	-0.0395*** (0.0084)	-0.0414*** (0.0086)	-0.0405*** (0.0084)	-0.0425*** (0.0087)
土地被征用	0.0473** (0.0225)	0.0477** (0.0221)	0.0380* (0.0230)	0.0386* (0.0227)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291*** (0.0042)	0.0305*** (0.0044)	0.0300*** (0.0042)	0.0314*** (0.0044)
照顾老人需要	-0.1490 (0.2370)	-0.1380 (0.1960)	-0.1390 (0.2370)	-0.1290 (0.2000)
常数项	0.4220*** (0.0420)		0.4280*** (0.0431)	
Adjusted R ²	0.2490		0.2560	
Pseudo R ²		0.2330		0.2420

注:模型 5、模型 6 分别为线性概率模型估计、Probit 估计的平均边际效应的结果,区域虚拟变量未控制;模型 7、模型 8 区域虚拟变量已控制;其余同表 3。

(2)一次乡城流动与二次跨区流动的主要差异一是人力资本素质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进行二次跨区流动。在一次乡城流动中,那些年轻、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户籍劳动力愿意流动到城镇。在二次跨区流动中,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由于工资水平较低,跨区流动的机会成本较低更愿意流动;而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因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促进其跨区流动。二是跨区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表 6 显示,只有一次流动经历的农民工月工资收入为 2 499 元,而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的农民工月工资收入为 2 796 元。说明农民工依赖于频繁的跨区流动来谋求更高的工资待遇。频繁的二次跨区流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实反映,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原因,农民工难以在一个城市安居落户,难以有稳定的职业发展,不得不进行二次跨区流动。这种频繁的跨区流动也不利于企业经营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表 6 最近一次外出务工工作时间、收入及支出

	平均每周工作 多少小时	平均每月 工作几周	平均月总 收入(元)	平均每月 支出(元)
仅一次流动	59.14	3.935	2499	1200
二次跨区流动	59.35	3.919	2796	1274

注:“仅一次流动”是指只有一次乡城流动经历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务工之后,没有再流动到其他城市务工。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

下对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进行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且流动比较频繁。(2)年龄偏大、人力资本拥有量较低的农民工更容易进行二次跨区流动;年龄较小、人力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进行乡城流动。这说明因为户籍的限制作用,使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决策与一次城乡流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3)提高收入是二次跨区流动的主要原因,农民工通过频繁的跨区流动提高了其收入水平。

与只有一次流动经历的农民工相比,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的农民工拥有更少的人力资本,但他们却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对这个问题本文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工资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由于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的农民工承担了跨区流动的成本,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工资收入;不过考虑这个成本因素,他们的净收益未必高于那些只有一次流动经历的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关数据资料,难以测算出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净收益。

由于农村户籍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安居落户,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虽然这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但过于频繁和过高的二次跨区流动不利于一个地区产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毕竟稳定的产业发展和企业正常经营需要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从本研究结果看,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有助于破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增进社会公平,还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非农劳动供给,减少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为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构建稳定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李靖(2008):《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2. 都阳、朴之水(2003):《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3. 梁雄军等(2007):《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4.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课题组(2014):《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进城”——由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状况调查引发的思考》,《光明日报》,6月17日。
5. 王桂新、刘建波(2007):《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6. 严善平(2006):《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论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管理世界》,第8期。
7. Borjas, G.J.(1994),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667-1717.
8. Knight, J., and Yueh, L.(2004), Job Mobility of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4), 637-660.
9. Zhu, N.(2002),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 213-230.

(责任编辑:朱 萍)